

威妥玛的翻译教材及翻译教学思想

马楷惠, 王继红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威妥玛是英国著名的外交官、汉学家。在华期间, 他大力改进译员课程, 主编了一系列具有系统性的口笔译双语翻译教材。在教材编写和翻译教学方面, 威妥玛坚持口笔译并重, 注重课文素材的真实性和鲜活性, 提出了实用的口笔译训练方法, 有针对性地运用直译和意译的翻译方法, 重视文化翻译, 这些都是他翻译教学思想的具体表现。威妥玛主编的一系列教材在翻译教材编写史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应当纳入中国翻译史、翻译教学史的研究范围。

关键词: 威妥玛; 翻译教材; 翻译教学; 口笔译; 翻译史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2023) 05-0122-08

0. 引言

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英国著名外交官、汉学家, 在华时间长达40余年, 以其创造的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 (Wade-Giles Romanization) 闻名世界。张卫东 (1998: 136) 认为, 应当“给威妥玛及其著作《语言自述集》(Yü-yen Tzŭ-erh Chi, 1867) 以科学评价和应有的学术地位”, 并将被“雪藏”了百余年的《语言自述集》引入语言学研究视野。此后陆续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威妥玛主编的其他中文教材《寻津录》(The Hsin Ching Lu, 1859)、《文件自述集》(Wên-chien Tzŭ-erh Chi, 1867) 等也相继被发掘与整理。学界对威妥玛系列教材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考察文本源流、版本及后世发展传播情况 (王澧华 2006; 内田庆市 2010; 宋桔 2011); 第二是将《语言自述集》等教材作为清代北京话文献, 考察语音、词汇、语法等特点 (内田庆市 2001; 宋桔 2011; 张美兰 2018; 王继红、全文灵 2021); 第三是从国际中文教学角度考察教材的编写、教学方法及对后世的影响 (施正宇 2016; 张惠芬 2019)。

以上研究极大地推进了学界对《语言自述集》等教材在语言 and 教学方面的认识, 但忽略了威妥玛主编教材的翻译教材性质及其在翻译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事实上, 《语言自述集》等是语言翻译类教材, 不但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学习素材, 还有大量翻译教学与练习方面的内容。因此, 本文将对威妥玛的个人经历进行社会历史性考察, 并以

收稿日期: 2022-11-07; **作者修订:** 2023-07-15; **本刊修订:** 2023-07-18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区域语言接触视角下语言变体的关联与演变”(2022JX016); 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建设重大标志性科研项目“互文视角下的近代国际中文教材改编与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传播研究”(2022SYLZD048)

作者信息: 马楷惠 (1996-), 女, 山西长治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翻译与语言接触, E-mail: 296030948@qq.com; 王继红 (1977-), 女, 黑龙江绥化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翻译与语言接触、世界汉语教育史和汉语语法, E-mail: wangjihong@bfsu.edu.cn。

此为基础, 重新认识其主编教材的翻译教材性质, 总结归纳其翻译教学思想。

1. 威妥玛外交官与汉学家身份的融合

威妥玛具有极高的语言天赋。在早年入伍英国陆军期间, 他便自学了拉丁文和希腊语。1841年, 威妥玛在来华游轮上学习了粤语。1842年抵达香港后, 他成为整个兵团唯一会说粤语的人, 因此被指挥官任命为翻译员。第二年, 威妥玛便上任香港英国殖民当局翻译。此后, 他于1845年任香港最高法院的粤语翻译, 1858年任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的中文翻译。(Henri 1895: 407; Cooley 1981: 9) 此外, 威妥玛曾参与《中英天津条约》《烟台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翻译与修订工作, 大量翻译《京报》, 多方面整理中国的消息和情报, 还翻译了《论语》《好逮传》《海国图志·日本卷》等, 表现出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卓越的翻译能力。

威妥玛长期从事外交与翻译工作, 主持和推动学生译员计划(Student Interpreter Programme of China), 为英国政府培养翻译人才, 积极编写英汉双语翻译教材。1854年, 威妥玛向时任香港总督包令(Sir John Bowring)、英国外相克莱顿伯爵(Earl of Clarendon; George Villiers)致信, 指出当时已经在华工作了十年左右的译员汉语水平进步并不大, 特别是由于缺乏翻译词汇表和其他辅助工具, 译员对汉语古籍和政治方面的著作往往束手无策, 无法胜任翻译工作。因此, 威妥玛呼吁改进译员课程, 并且提出辞去海关税务司的职务, 申请加入译员培训工作之中。在全面执掌译员计划的十多年里, 威妥玛从各个方面推行改革措施。第一, 从严聘用教师, 并且按照学生所在地及其所需要学习的方言来分配教师。第二, 威妥玛亲自编写翻译教材, 反复强调译员应当兼备口语和书面语两种翻译能力。第三, 威妥玛注意到学生译员公差繁忙, 导致学习汉语分身乏术的状况, 他指出应当彻底改变当时课程的工余课程性质, 调整课程模式, 让学生来华首年全身心地学习汉语, 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有效翻译。由于威妥玛的严格管理, 学生译员计划在中国得以顺利开展, 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翻译人才, 其中不乏一些汉学家和汉语学者。

威妥玛来华初期, 南京官话教材更为多见。善于审时度势的威妥玛对中国官话的发展方向做出了准确判断: 当时会说北京官话的各地官员数量更多, 英国驻华使馆培训译员的目的是与中国官员沟通, 因此应该学习北京官话, 编写北京官话教材。威妥玛在《寻津录》序言中指出, 北京话之于汉语就如同巴黎腔之于法语, 北京官话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官方翻译人员必须学习的内容, 他在《语言自述集》(第1版)序言中重申了这一观点, 并且断言, 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服务的初学者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 他正在学习的语言正是当时政府主要官员所说的话。

在翻译实践与教学工作之外, 威妥玛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风俗民情、历史、国情等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形成了独到的见解, 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1866年, 威妥玛在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的授意下向总理衙门呈递《新议略论》, 旨在对清政府的外交、内政提出批评与改革建议。史学界多从内容方面进行阐释, 认为其对洋务运动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我们站在客观的角度来审视《略论》, 不谈威妥玛的主观动机, 在威妥玛的观点中不乏正确指出清政府弊病之言, 这些建议无疑是有远见的忠告”(王晓艳 2016: 46)。1883年, 学者理查德(Richard Temple)在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宣读论文《中国历史的政治经验》(Political Lessons of Chinese History), 威妥玛对其做出点评, 并对粤人抗元、中国君臣关系、太平天国运动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Temple & Wade 1883: 229-241)这些都充分

展现了威妥玛丰富的汉学知识。

在外交官和汉学家的双重身份中,威妥玛对自己的定位也有过矛盾与挣扎。根据《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记载,1865年9月14日,“威妥玛上午来,我们讨论了他的《中国学生工作大要》。他想丢掉外交,研究语文学——他说计划在今后20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凯瑟琳,等2005:406)。1866年1月4日,“和威妥玛共进晚餐,他打算投身外交工作,已决意将语文学家派作辅助性的用场算了”(凯瑟琳,等2005:440)。关诗珮(2017:317)认为,“威妥玛对汉学由衷地喜爱,是他愿意管理译员课程的最大动机。”在长期的在华外交与翻译工作中,威妥玛最终将外交官和汉学家的身份有机地融合起来,并把这种优势充分地体现在翻译和语言教材编写工作之中。

2. 威妥玛主编教材的翻译教材性质

2.1 威妥玛主编系列教材概况

整体来看,威妥玛系列教材将基础语言教学与翻译教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体现了早期翻译教材的特点。威妥玛主编的系列教材具体如下:1)《寻津录》,1859年由香港China Mail印刷出版。全书共分为两册。第1册包含英文与中文平行对应的三部分课文内容,第2册为《北京话音节奏》。2)《问答篇》《登瀛篇》,1860年刊刻于上海。两书均为中文,共用一篇序言。《问答篇》为103段会话,《登瀛篇》共48章,每章先列出该章使用的主要词汇,然后展示例句。3)《语言自述集》,第1版由伦敦Trübner & Co.出版社于1867年出版,共有4册。第1册为《口语系列》,包括发音、部首、会话等8章;第2册为《口语系列》答案;第3册为平仄篇,是按照音节和声调排列的记录北京官场所说方言的汉字总汇;第4册为汉字习写法。后于1886年出版修订版,1905年出版删节版。4)《文件自述集》,1867年由伦敦Trübner & Co.出版社出版。上册选择148篇中国政府文件作为范文,帮助学生译员学习中国官方书面语言;下册为第1—75件文件的英译及第1—65件文件的英文注释。1905年出版删节版,第1册删减至75篇,第2册没有变化。

2.2 翻译教学的目的性强

“翻译学习中包含语言学习,但翻译学习中的语言学习始终是以翻译为目的、为导向,是为翻译服务的……语言学习则可以相对独立于翻译学习。”(张雯、王琦2013:19)翻译课程与国际中文教学课程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以学习汉语为手段,最终目的是要配合源语进行翻译;后者以学习汉语为最终目的,翻译只是一个功能性过渡的手段而已,两者在实际功能、知识的生产过程、理论建构及产品方面,是有很大分别的”(关诗珮2017:325-326)。在各教材序言中,威妥玛多次提到了编写教材的缘由和目的,《寻津录》便是在为英国政府工作的翻译学员的建议下编写的。《自述集》系列“是根据政府学生的要求而不是任何其他读者的要求编写的”(Wade 1867b: iii)。《问答篇》《登瀛篇》的序言中写道“予奉命来中土,职兼教习翻译事务,因与应君龙田以官话设为《问答》,笔之于篇,又为《登瀛篇》。是二编也,诚后学之舌人翻译之嚆矢也。”可以看出,威妥玛系列中文教材是面向英国外交部翻译工作人员编写的专门用途教材,旨在帮助翻译学员掌握翻译技能。

作为翻译教材,威妥玛在编写时注重双语平行对应。《寻津录》《语言自述集》《文件自述集》设置中英分册,英文部分是对中文部分的翻译与注释。相较于第1版《语言自述集》,第2版得益于印刷技术的改进,实现了中英同页分栏对照,更加利于阅读和翻译训练。

但是应当指出, 作为近代早期翻译教材, 《语言自述集》等与现当代流行的规范化翻译教材不尽相同, 囿于译员学习者的实际情况及速成培养要求, 译员并非在具有较好语言能力的情况下开始翻译学习, 翻译教材因此更多地呈现出语言教学和翻译教学相结合的特点。在学习的起始阶段, 语音和汉字书写练习尤为重要, 《寻津录》和《语言自述集》都有一定比重的语音教学内容, 《语言自述集》专门设有“部首章”, 并且有独立的《汉字习写法》分册, 掌握这些知识是译员进行翻译学习的重要基础, 这也体现了早期翻译教材的特点。

2.3 口笔译教材双线推进

《自述集》系列是威妥玛主编的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教材, 包括口语 (Colloquial) 和文件 (Documentary) 两个系列, 分别是《语言自述集》和《文件自述集》, 基本功能是帮助领事馆的学员打好基础, 用最少的时间掌握官话口语和书面语。

《语言自述集》中所收的词汇与短语都是口语性质的, 用于训练译员的口译能力。因为缺少可直接使用的北京话口语文献作为素材, 威妥玛大费精力来编写北京话口语教材。他先是出版了《寻津录》《问答篇》《登瀛篇》等, 这些教材的内容经过进一步改编与优化, 又被收录到《语言自述集》中。《寻津录》第3册的内容依据的是四声编排的北京音节表, 《语言自述集》对其增补完善, 最终确立了著名的威妥玛式拼音。《问答篇》与《语言自述集·谈论篇》内容大致相似, 具有因为改编而形成的互文关系。(王继红、全文灵 2021: 16) 《登瀛篇》主要是中文词汇与例句, 后被改编为《语言自述集》中的“散语章”“续散语章”。

《文件自述集》收录大量真实文件, 都是书面语性质的公文, 旨在帮助学生译员提升公文类书面翻译能力。按照文件的内容和来源, 148 篇文件被分为 16 卷, 包括平行公文、往来信函、小民禀稿、欸贴法程、移详公牒、陈公檄文、韩公奏疏、林公奏疏、蓝玉霖书、钱恬斋尺牍、李牧堂书、陶公尺牍、吴公尺牍、杂文、贸易规则、续录。序言中, 威妥玛指出前 4 卷内容足以帮助译员们解决在领事馆工作中需要即刻处理的问题。

总的来说, 威妥玛编译教材注重口笔译双线推进, 系列教材在内容上具有延续性, 并且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优化。这充分体现了威妥玛系列教材实用性高、系统性强的特点。

3. 威妥玛的翻译教学思想

3.1 口译笔译并重, 素材鲜活真实

中国传统教育重视书面语写作, 对口语表达训练不够重视, 但威妥玛清醒地认识到, 外交翻译人员的汉语口语能力培养十分重要。如果学习者仅仅通过师生对话来学习口语, 而未接受专门的训练, 是不可能熟练掌握口语的。《语言自述集》(第1版) 序言中提到, “一个耳朵灵敏的人可能会认为, 在跟随母语教师学习书面课时, 老师的口头解释会塑造他口头说话的习惯, 这样他不用费很多力气就可以掌握口头表达, 并且在阅读方面的进步也会很明显”, 威妥玛认为, “不会有比这更严重的错误”(Wade 1867a: xiv)。因此, 对于译员来说, 口语的专门练习相当重要, 这是口译的基础。

但是, 强调口语训练并不意味着口语比书面语更加重要, 威妥玛认为二者不可相互替代, 口译与笔译教学应当双线并行推进。《语言自述集》(第1版) 序言中明确提出, 对于领事馆的学员来说, 他们需要掌握的书面语知识一点儿也不少于口语知识。他们不仅要学习对话交流, 还要学习中英书面语互译。译员的首要职责无疑是运用口头语言, 但是书面文字上的任何错误都是需要避免的。

从口译教材的文本改编方面可以看出威妥玛对口语真实性和鲜活性的追求。《问答篇》被改编为《语言自述集·谈论章》时,“增加了各类话语互动标记,使文本呈现出强烈的现场互动特征”(王继红、全文灵 2021: 16)。《寻津录》中“圣谕广训”部分改编自王又朴的《圣谕广训衍》,加入大量北京话儿化音,把文言字词转换成白话形式。书面语笔译教材《文件自述集》收录了 148 篇文件体范文,这些素材都来自真实的文件,第 1 件便是时任两广总督耆英给香港总督璞鼎查的照会文。

3.2 口译“语”“文”同步,笔译眼耳并用

通常来说,口译训练注重听说,笔译训练注重读写。但威妥玛在口译教学中强调学习者要注重落实语音的书面形式,笔译教学中建议学习者重视掌握每个字符的发音。这充分体现了他提倡口笔译互相补充、结合练习的思想,在其所处的时代难能可贵。

威妥玛培养口译人才要求“语”“文”同步。“语”指的是语音、声调的口头练习,“文”指的是落实语言的书写形式。《语言自述集》(第 1 版)序言指出,“眼睛和耳朵需要协同工作,在学生确认了词语的书写形式后,才算是掌握了这个词”(Wade 1867a: viii),并指出有些中文说得非常好的人局限于在语音上获得一种方言,但是转向书面语的时候,却发现倍感困难。因此,将一个语音的书写形式落在实处是必要的,这不仅对口译练习有益,也为笔译练习提供了重要基础,即“如果有耐心在尝试文件系列的学习之前掌握口语系列课文,就能熟悉书面语汇的形式和意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翻译的困难”(Wade 1867a: iv)。施正宇(2016: 80)也提到,威妥玛在《语言自述集》的汉语字词教学中,以汉字为主、拼音为辅,使学习者在学习音节的同时开始汉字的学习,做到了“语”“文”同步。

至于笔译练习,威妥玛给出具体建议:“如果汉语学习者早已对口语系列比较熟悉,那么绝大多数书面文字他看一眼就会明白。此时,我会建议他们接下来这样做:首先,通读即将学习攻克文本之译文,确保对原文主旨的理解准确无误。其次,请他们的老师多次重复朗读相应文本的中文原文,直至对每个汉字的发音都可以确认无疑,否则这类发音上的疑惑将对后续学习造成极大障碍。借助此前汉字学习中积累的知识,以及从翻译中形成的对整部文献的清晰概念来阅读文本,学习者将会发现,即使在开始正式翻译之前,他们对于文本的理解程度已经足以创造出一篇译文。此后,学习者可以借助书中提供的注释来尝试翻译,这些从头排列好的注释完全可以替代词汇表。当然,学习者最后还是应该将自己的译文与答案中提供的译文进行比较。”(Wade 1867b: iii)由此可知,理想的笔译练习可以分为 4 个步骤:第一,学习者阅读所学文本的英文译文,确保准确地理解文本的主旨大意;第二,请老师多次朗读相应中文文本,直到确定每个字符发音;第三,借助文本中提供的注释来尝试翻译,而不要急于查词汇表;第四,将译文与教材提供的答案进行比较。其中第二个步骤至关重要,这种高效翻译机制体现了威妥玛在笔译练习中坚持眼耳并用、重视与语音结合的理念。

3.3 直译意译并举,翻译方法适当

威妥玛在翻译中,根据不同目的灵活采用意译和直译的翻译方法。编写教材时,为使学习者了解词语的对应关系,运用逐词对译的直译方法,但一般同时平行呈现句子的意译。现以《寻津录》中“天类”第 23 条为例,例(1)与例(1a)的英语意译、例(1b)的英语直译(lit.,即 literal English)构成互文对照文本。直译文本严格遵循汉语语序,将具有比喻义的“风云”“旦夕”“祸福”逐词翻译为 wind and clouds、morning and evening、woe and

weal。此外,将“不测”译为 not-to-be divined,为了让学习者理解“测”的含义,又括注了 fathomed 用以解释字面含义。

(1) 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寻津录》第1册,Chinese text I)

a. The day's fortunes are no more to be foretold than the weather. (《寻津录》第1册,第2页)

b. Lit. The heavens (or the sky) have their not-to-be divined (lit. fathomed) wind and clouds; man has his morning's and evening's woe and weal. (《寻津录》第1册,第2页)

《寻津录》第1册第二部分“圣谕广训”中,编译者用 Paraphrase 标示英语意译,用 Literal English 标示逐词对译的直译。直译文本严格遵照汉语语序,将“万岁爷”译为 the Lord of ten thousand years,用 Sacred、Philanthropic 来解释“圣祖仁皇帝”,将汉语中“坐了……天下”的表达对译为 sat...empire,并在“[]”中增添相应内容,使得句子语义完整、逻辑显化。例如:

(2) 【圣谕广训衍】万岁爷的意思说,我圣祖仁皇帝,坐了六十一年天下,最敬的是祖宗。(《寻津录》第1册,Chinese text II)

a. 【Paraphrase】His Majesty means to say, that during the sixty-one years that our Emperor, the Sacred Ancestor canonised as the Humane, reigned over the empire, his Ancestors were the chief object of his veneration. (《寻津录》第1册,第49页)

b. 【Literal English】It is the Lord of ten thousand year's intention to say [that by] our Emperor, the Sacred Ancestor, [canonised as] the Philanthropic, [while he] sat sixty-one years [on the throne of the] empire, [the object] most revered was [his] Ancestors collectively. (《寻津录》第1册,第57页)

与意译相比,直译能更好地呈现出双语的对应关系,便于学习者了解中文含义,建立起双语转换的中间过程,为学习者提供帮助。中国历史上的蒙汉《元朝秘史》、满汉《清文指要》等双语教材也都是采用直译的方式,主要考虑词语的对应关系,翻译教学目的突出。

除中文教材外,威妥玛还翻译了一系列中文著作,如《论语》《红楼梦》等,用作译员学习的辅助材料。在1854年提交的《汉语学习备忘录》中,威妥玛提到“为了去除现存学习汉语的障碍,在服务外交部期间,我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用作收集书籍、研究、统计资料及其他东西上。我已正式开始翻译大部分的古籍——这些内容形成了中国人思想中最晦涩的部分,其重要性不亚于学习官样文章。我认为这些都是译员最应该学习的”(关诗珮 2017: 302)。威妥玛翻译《红楼梦》有比较明显的汉语教学与翻译人员培养动机,惯于为音译的名称加上声调,直译痕迹非常明显,注重原文结构(王烟朦、许明武 2017: 288)。威妥玛的《论语》英译本也主要采用直译的方法(李钢 2011: 103; 张德福 2016: 91)。

3.4 重视文化翻译,精读泛读结合

威妥玛非常重视文化翻译,鼓励译员通过增加阅读量来增强自身的史地、文化等知识。第一,改编中国已有的语言翻译教材。满文《一百条》是清代的满语口语教材,后来又被翻译为蒙古语和汉语等,形成了《初学指南》《清文指要》等一系列双(多)语教材,其中的汉语译文后续被威妥玛改编为《问答篇》《语言自述集·谈论篇》。又如《语言自述集》(第2版)将《西厢记》改写为当时的北京话读本,《寻津录》中“圣谕广训”的蓝本出自为解释雍正《圣谕广训》所作的《圣谕广训衍》,这些取材不仅增强了课文的趣味性,

也有利于学习者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第二,注重文化材料的阅读。威妥玛在《语言自述集》序言中指出,习俗不同会使得外国译员们和中国人的交往受到限制,小说中反映的中国思想和国民性比别的任何素材都更适合作为了解中国的有效途径,译员必须读中国通俗小说。威妥玛推荐了《好逑传》《平山冷燕》《玉娇梨》等作品作为学习辅助的材料,强调无论是翻译过还是未翻译过的小说,都应该和能解释小说中典故的有学问的本地人共同阅读。第三,充分使用副文本形式对文化知识进行注释。《寻津录》中“天类”记载了很多19世纪中国的风俗民情,威妥玛在编写时非常重视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比如官员们在参拜时会高呼“万岁万岁爷”,为便于外国译员理解,便将“万岁爷”直译为“一万年的主”,这可以和英文“O king, live for ever!”对比掌握,见例(3)。

(3) 【Observations】His Majesty. lit., lord of ten thousand years. At levees, & c., as the officials prostrate themselves they cry, wan sui wan sui Yeh! Lord of a myriad years, a myriad years! compare, O king, live for ever! (《寻津录》第1册,第53页)

这种方法在威妥玛其他的翻译作品中也有体现。威妥玛在翻译《红楼梦》时,涉及“甄士隐(真事隐)”“十里街(势力街)”等寓意深刻的人名和地名时,都会采取音译加文内注释的方法,力求保留源语富有特色的表达方式,并且准确地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王烟朦、许明武 2021: 159) 张德福(2016: 90)指出,与其他《论语》英译本相比,威妥玛的《论语》译本采用附注存真的翻译策略来再现原作风貌,书中大量注释内容是其重要特色。这些注释包括夹注和脚注两类,意在提供释义信息、同义替换、解释语境、提示背景信息等。此外,在《海国图志》的翻译中,威妥玛也运用了大量的副文本对文中的人名、地名、官职等进行补充说明。

4. 结语

纵观威妥玛在华期间的翻译教学实践,充分体现出他作为外交官和汉学家复合身份的融合。威妥玛编译中文教材,翻译中文文献,不仅是为了帮助西方人了解中国语言文化,为英国政府培养翻译人才,实现其政治目的,还体现出他对汉学的兴趣和热爱。除了从文献学、语言学、国际中文教育的视角来考察《语言自述集》等材料外,还应重视翻译角度的考察。

从现有翻译史研究来看,学界在考察中国翻译教学的起源与发展时,会追溯到元代的“回回国子学”(付克 1986: 7)或1862年开办的京师同文馆及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穆雷 1999: 3),但记载当时翻译教学的相关资料非常少,“翻译多年来一直是外语学习的手段,而不是一门专业,即翻译始终是作为外语教学流派中的一种——语法翻译法而存在的。无论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译员还是一般外语人才,都很少有正规的翻译课、翻译教材及其有关的研究资料”(穆雷 1999: 7)。早期的翻译研究囿于资料的不足,往往难以开展,导致现今的翻译教学史研究存在详今略古的问题(邹振环 2017: 44)。威妥玛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持翻译教学、编写翻译教材,虽然其教学对象是外国人,但教学地点在中国,且教材内容均以双语形式呈现,其翻译作品应当成为中国早期翻译研究、翻译教材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推动了文化交流和人类进步。中国翻译史上,从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到明清《华夷译语》系列书籍的编纂,始终面临双语、多语人才短缺的问题,导致翻译教学较早被提上日程,呈现出学习教材同时作为语言类教材和翻译类教材、语言教学和翻译教学相结合的特点。威妥玛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编译的系列教材也是如此,不仅体现了对传统字书、辞典

中双语对照形式的继承, 而且对教材设计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与探索, 其系列教材系统性强, 体例完备, 可以说是中国翻译教材编写史上的一次重要尝试, 对翻译教材的编写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威妥玛系列翻译教材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 应当成为中国翻译史、翻译教学教材史、翻译微观史研究的一个分支。

参考文献:

- [1] 付克. 中国外语教育史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
- [2] 关诗珮. 译者与学者: 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建构 [M].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7.
- [3] 凯瑟琳·F. 布鲁纳, 约翰·K. 费正清, 理查德·J. 司马富. 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M]. 陈绛, 译. 北京: 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5.
- [4] 李钢. 威妥玛《论语》译本介评 [J]. 学术论坛, 2011, (2): 101-103.
- [5] 穆雷. 中国翻译教学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6] 内田庆市. 与“您”有关的问题 [C] // 内田庆市. 近代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 関西: 関西大学出版部, 2001: 395-421.
- [7] 内田庆市. 《语言自述集》源流及其在日本的传播 [C]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跨越空间的文化: 16—19 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46-62.
- [8] 施正宇. 从《语言自述集》看威妥玛的汉语字词教学 [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6, (4): 77-91.
- [9] 宋桔. 《语言自述集》的文献和语法研究 [D]. 上海: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
- [10] 王继红, 全文灵. 从话语互动看威妥玛《语言自述集》对《问答篇》的改编——兼论话本小说叙事传统对清代北京话的影响 [J]. 华文教学与研究, 2021, (3): 16-24.
- [11] 王澧华. 《语言自述集》的编刊与流传 [J]. 对外汉语研究, 2006, (00): 182-195.
- [12] 王晓艳. 《新议略论》述评 [J]. 黑龙江史志, 2016, (6): 41-47.
- [13] 王烟朦, 许明武. 《红楼梦》威妥玛译本窥探 [J]. 红楼梦学刊, 2017, (6): 279-295.
- [14] 王烟朦, 许明武. 论《红楼梦》威妥玛英译文的文学性取向 [J]. 曹雪芹研究, 2021, (2): 152-165.
- [15] 张德福. 威妥玛与《论语》翻译 [J]. 外语研究, 2016, (1): 86-91.
- [16] 张惠芬. 《语言自述集》教材编写的解构与启示 [J]. 华文教学与研究, 2019, (3): 71-78.
- [17] 张美兰. 从文本比较看威妥玛所编汉语教材的北京口语特征 [J]. 语言学论丛, 2018, (2): 301-323.
- [18] 张卫东. 威妥玛氏《语言自述集》所记的北京音系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4): 135-143.
- [19] 张雯, 王琦. 翻译学习与语言学习之异同及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J]. 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 18-22.
- [20] 邹振环. 20 世纪中国翻译教学史研究简评 [J]. 东方翻译, 2017, (4): 44-50.
- [21] Cooley, J. T. F. *Wade in China: Pioneer in Global Diplomacy 1842—1882* [M]. Leiden: Brill, 1981.
- [22] Henri, C. Thomas Francis Wade [J]. *Toung Pao*, 1895, 6 (4): 407-412.
- [23] Temple, R. & T. F. Wade. Political lessons of Chinese history [J].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883, 1 (3): 229-241.
- [24] Wade, T. F. *Yü-yen Tzū-erh Chi* 语言自述集 [M]. London: Trübner & Co., 1867a.
- [25] Wade, T. F. *Key to the Tzū-erh Chi: Documentary Series* [M]. London: Trübner & Co., 1867b.

(责任编辑 刘 心)